



《故事新编》新探

周凡英

花山文艺出版社

《故事新编》新探

周 凡 英

---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9 3/8印张 2 插图 193,000字 印数：1—6,15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93 定价：0.76 元

# 目 录

## 一、绪 论

关于《故事新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1 )

## 二、分 论

(一) 为“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社会而斗争

——《补天》试论……( 18 )

(二) 战士的苦闷

——《奔月》试论……( 35 )

(三) 反抗和复仇的怒吼

——《铸剑》试论……( 55 )

(四) 民族英雄主义的赞歌，抗日、反蒋的檄文

——《非攻》试论……( 72 )

(五)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

却是荒淫与无耻”

——《理水》试论……( 90 )

(六) 消极逃避者的历史悲剧

——《采薇》试论……(105)

(七) 对反动派复活老子思想的清算

——《出关》试论……(124)

(八) 现代庄子的漫画像

|               |       |
|---------------|-------|
| ——《起死》试论····· | (139) |
|---------------|-------|

### 三、综 论

|                            |       |
|----------------------------|-------|
| (一)《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        | (155) |
| (二)《故事新编》的创新与融古铸今的特点·····  | (182) |
| (三)融古铸今与《故事新编》的现实主义特色····· | (202) |
| (四)《故事新编》的艺术风格·····        | (231) |
| (五)启示和借鉴·····              | (255) |

### 四、附 录

|                     |       |
|---------------------|-------|
| 论《故事新编》的社会历史意义····· | (266) |
|---------------------|-------|

|          |       |
|----------|-------|
| 后 记····· | (295) |
|----------|-------|

## 一、绪 论

### 关于《故事新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鲁迅研究中，对于《故事新编》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自作品问世，几十年来，不仅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相对地较少，而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意见纷纭，长期争论而进展甚缓。以致至今许多读者甚至某些研究者，仍然因为《故事新编》不易读懂而误以为这是一部没有多大意思的作品。

在《故事新编》研究中，人们共同感到困惑而实际上又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带关键性的）问题是：一，作品既从古代历史、神话、传说取材，却又直接写了大量现代的人物和事物，古今交织，融古铸今，形成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所谓“油滑”。这种现象究竟该怎样解释和评价？二，关于作品的创作方法，在这样以历史为素材的创作中，似乎同时描写了古代和现代绝难统一的两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符合现实主义，还是违反现实主义？几十年来，这两个问题成了人们研究和争论的焦点和核心，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大体上也就反映着《故事新编》研究的进展情况。

回顾起来，当《故事新编》结集问世之初，三十年代

末，有过为数不多的评论文章，总的来看，那基本是一些读后感式的评论，还谈不上系统的研究。四十年代，出现了若干研究鲁迅创作的论著，其中涉及到《故事新编》，可以说是对《故事新编》研究的真正开始。以上这些评论和研究，虽然还只是很初步的、粗略的，但是因为距离《故事新编》创作的年代较近，同是处在《故事新编》所产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更容易直接看到和理解作品所写的社会生活内容，因此，对作品的某些具体思想内容的分析，常常有其切实的和精辟的见解。正因为如此，这些最初的评论和研究，一开始也就触及到了阐释和评价《故事新编》的上述两个根本问题，并开始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前一个问题，持肯定意见者，以茅盾的评论最为明确和精到。他在《〈玄武门之变〉序》中说：鲁迅的《故事新编》，最能体现其“内容的深刻”之点，是在作品中“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持不同意见的评论者则认为，鲁迅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属入现实的内容，是“为了对当前某些时弊的针贬，不惜使自己的作品‘流于油滑’，不惜‘将宏大的结构毁坏’，这儿我们应该体味到鲁迅的不得已的悲哀的。”<sup>①</sup>鲁迅在“许多取材于历史的小说中，因目前的愤懑而歪曲古人”，这表现了“鲁迅的主观感情之强烈，常常冲出他的冷静的艺术形式之外。”<sup>②</sup>总之是违反了历史的真实，造成内容上古代与

---

① 《石怀池文学论文集》第10页。

② 欧阳凡海：《鲁迅的书》。

现代的不统一、不谐调。

第二个问题，应当说提出的更早一些。1923年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说：“《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表示了他不甘拘守着写实的门户。他要进入纯文艺的宫廷。”这里所讲的实际就是《补天》（原题《不周山》）与《呐喊》中其它作品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问题，认为《补天》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三、四十年代的多数评论，从对作品所反映社会生活的分析，肯定了《故事新编》的现实主义精神。少数论者则继续对《故事新编》的现实主义持否定意见，以欧阳凡海为代表。他说：“我们不能说鲁迅取材于历史的小说在原则上是现实主义的，……没有一篇足以作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处理历史题材的完整的范型的”，其主要根据，就是认为作品中存在直接表现现实生活的“油滑之处”，违反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十年代，《故事新编》的研究，受到人们更多的注意，有了明显的进展。围绕着怎样阐释和评价几乎每一篇作品中似乎都写了古今两个时代的问题，分歧也愈来愈明显，争论愈来愈激烈。1957年前后，有的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过一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归纳起来，基本仍是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故事新编》既然取材于历史，就应该看作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作品内容，确实就是在写历史上的“古人”、“古事”，反映古代社会的历史真实。所谓“油滑之处”，乃是在写古人、古事过程中偶一为之的杂文手法，夹杂进一些“暗喻”的直接抨击现实的细节。这从内容上说，两

者是不统一、不协调的，从艺术上说，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从创作方法说，在历史创作中闯入现代生活，则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削弱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因此是非现实主义的。另一种意见，则专门强调《故事新编》通过直接描写现代人物、现代情节，有力地揭露和攻击了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带来了作品强烈的战斗性。由此认为《故事新编》的内容并不在于写历史，而仅仅是为了讽刺和批判创作当时的某些社会现实，它实际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或“寓言似的讽刺作品”。并由此论定，作品中直接描写现实的部分才真正体现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

以上两种意见，各执一端，针锋相对。虽然各对自己所强调的部分（前者强调“古”，后者强调“今”）作了更详细的论述，对理解每一篇作品的具体内容不无帮助，但这两种意见，共同地都把作品割裂为互不联系、截然对立的“写古”和“写今”两个部分，从总体上，使《故事新编》作为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阐释了。

1957年前后的集中讨论以后，虽有一些同志一直基本上摆脱不开上述两种意见的束缚，但更多的研究者终于逐渐发现，这样把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主义地割裂成写“古”和写“今”两个部分，并将两个部分对立起来，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整个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是不可能真正理解《故事新编》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的。于是，一些新的、值得重视的意见和问题，陆续被提了出来。其总的倾向，表现为这样几点：一，努力探寻和阐释写“古”和写“今”之间的联系，试图说明两个方面在作品中是完整统一的；二，



指出不要死板地用历史小说这个概念的传统命义来解释《故事新编》的性质，强调研究作为现代文学开拓者的鲁迅，在《故事新编》创作中，对于传统观念的无情嘲弄和开一代风气的革命首创精神；三，在肯定《故事新编》的现实主义的同时，提出了作品具有某些浪漫主义成份的问题。这些基本意见，从原则上讲，无疑都具有正确性，而且是很重要的，是《故事新编》研究上的重要前进。但是，把这些观点落实到具体分析作品，却仍然难以圆满解决理解和评价《故事新编》的症结问题，即怎样解释和评价一部作品中为什么居然同时描写了貌似古今两个时代的生活内容的问题。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按照这些观点，虽然力图说明写“古”和写“今”的统一，但大前提终究仍然是认定作品中存在着一是写古、一是写今的两个部分，肯定了同一文学作品中直接写了两个相距遥远的时代的生活，这就不可避免地仍然导致承认作品违背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文学真实性的要求，从而把矛盾推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

三十年代，茅盾同志在《〈玄武门之变〉序》中，指出《故事新编》“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基本特点之后，曾经颇有感慨地说：“鲁迅先生这手法，曾引起了不少人的研究和学习，然而我们勉强能学到的，也还有他的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这一面，而他的更深一层的用心，——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恨与应爱，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则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时间过了四十余年，从前面的简单回顾来看，对于鲁迅《故事新编》的这种独特手法，似乎我们至今

仍然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因此也就无法学到。这简直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面对着这种状况，为了把《故事新编》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我觉得有必要认真检讨一下我们的研究方法问题，或许可以有助于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从《故事新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首先值得检讨的一点，是分析与综合的结合问题。

分析的方法，是认识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也有分析，分析与综合相结合，构成研究事物的完整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的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sup>①</sup>这里，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说明了在认识事物，研究和解决问题时，运用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故事新编》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偏颇。一种是缺乏综合。有些同志，往往只限于对某几篇被认为是重要的作品，进行就某篇论某篇的一般分析，而缺少对整部作品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因此难以从总体上把握这部作

---

① 《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840页。

品的性质、特点、成败和历史意义。另一种是缺乏分析，没有经过对全部八篇作品进行系统的分析，就急于作出某种综合性的论述或结论。特别成问题的则是分析的缺乏。

分析的缺乏，使一些同志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一些评论，对《故事新编》作品本身从内容到形式比较复杂的情况，作家主观原因和社会客观条件等比较复杂的创作背景，都未进行足够的细致的调查和分析，而只是作了一些比较笼统的、原则上的判断和推论，就仓促地得出了最后结论。所以，结果，要么简单地认定“油滑”就是“缺点”，是败笔，是不必有的，绝对地否定；要么绝对地认为只有“油滑”之处才体现了作品的战斗意义，而不去研究以至抹杀作品完整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分析的缺乏，使一些同志不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透过表面去探寻和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在《故事新编》研究中，对于所谓“油滑”问题，人们之所以一直感到困惑莫解或不得要领，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经常只停留在现象上，形式主义地只看到古与今的矛盾，而没有把这种矛盾现象当作研究《故事新编》的入门的向导，注意透过矛盾的现象，去研究这种现象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本质。事实上，对于《故事新编》中的这种古今矛盾的现象，当人们只把它停留在现象上看待时，是理解作品的一大难题，当透过现象把握了其实质时，却恰恰成为读懂《故事新编》的一把钥匙。读完本书后面对《故事新编》的具体分析，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分析的缺乏，更严重地妨碍着综合研究的进行。恩格斯

说过：“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sup>①</sup>《故事新编》问世几十年来，对八篇作品中有的篇什，似乎很少有人更认真地写出一篇切实的分析文章。笔者受条件限制，未能搜求评论《故事新编》的全部资料，就我所见，几乎也还不见一位研究者，系统地对八篇作品逐一作出稍微详尽的分析。在这样完全谈不上系统和周密分析的情况下，多数论者却只就一些属于综合性的课题进行研讨和辩论。那么，这种研讨和辩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究竟怎样，就实在是值得研究的了。例如人们谈论最多的《故事新编》的所谓“油滑”问题，如果想综合地探讨这一问题的实质，并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首先就应当对每一篇作品中的“油滑”之处，进行周密的调查和分析，并进而从八篇作品的创作过程，系统地考察这“油滑”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在此基础上，然后综合起来研究它与作家的指导思想、艺术构思、创作方法以至作品体裁性质的关系。而许多评论却没有进行这种周密、系统的分析研究，往往只支离破碎地拣出某几处“油滑”的现象，甚至仅仅孤立地就某一篇作品的某一点（如《补天》中写了那位“古衣冠小丈夫”），就轻易地得出全面否定的结论，武断地认为所谓“油滑”之处就是“缺点”，是“不必有”的等等。

《故事新编》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另一个更加值得检讨的，是研究的出发点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sup>②</sup>就《故事新

---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整排合订本第854页。

编》研究来说，所谓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作品本身的实际出发，一是从作品创作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现实生活的实际出发。下面就这两个方面分别来谈一谈。

先谈从作品本身的实际出发的问题。

用鲁迅自己的说法，《故事新编》是从历史（包括神话、传说）取材来创作的小说。但它与通常所见的历史小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它在历史故事中，直接写到了大量现代事物和人物，形成了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所谓“油滑”。面对这样一部特殊的作品，我们怎样来研究和评论它呢？一种方法，是从形式上看到它既然是从历史取材的小说，便拿出历史小说的现成概念，把文学原理上关于历史小说的传统命义和具体要求，套在它身上，于是认为它不符合“严峻的历史小说形式”，违背了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对历史题材采取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原则，以至导出《故事新编》乃是作家采用历史小说形式不够成熟的结果等等否定的评价。总之，合乎现成概念的，就可以理解和接受，就给以肯定；不合于现成概念的，就不能理解和接受，就加以否定。这是从概念和定义出发的方法。还有一些评论，否认《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认为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杂文性的讽刺作品。虽然具体结论不同，但其基本方法，仍然是从历史小说或其它文学体裁的传统概念的形式主义出发，不过是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发现《故事新编》的某些内容和形式，无法纳入历史小说的传统概念和要求，于是干脆否认它是小说。上述两种评论，都没有对作品本身做出严密的有说服力的分析研究，而陷于在概念和定义上兜圈子，结果才形成长期争论不清，似乎公

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正确的方法，应当从对作品本身的艺术分析，去探讨作品的特点、实质和成就。对于《故事新编》这样独特的作品，尤其要紧紧抓住其独特之处，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具体的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从而达到符合实际地把握和评价作品。

具体说来，对作品进行分析评论的基本要求，是以艺术形象作中心，从艺术形象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和引起的美的感受出发，联系着其它方面的情况去进行分析。其中，分析主要艺术形象，分析主要艺术形象和环境（包括其它人物）的关系，又是这种基本要求的决定性环节。研究《故事新编》，评论其独特之处，并进而把握整个作品，也必须遵循这种要求和途径。我们过去的一些评论，谈到《故事新编》的最主要特点——即所谓“油滑”问题时，之所以难以做出符合作品实际的解释和评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往往脱离了对作品所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是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把“油滑”之处看成与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是主要人物形象没有必然联系的、游离于作品完整内容之外的东西，甚至说成是额外任意臆杂进去的东西，以致把对作品的基本特点、性质和意义的讨论，与分析人物形象脱离开来，把作品有机统一的内容，割裂成写古和写今两个完全对立、互不相联的部分。如果我们对八篇“故事新编”逐一地进行具体和细致的分析，特别是进行人物形象的分析，就会看到，所谓“油滑”之处，完全不是游离于作品基本内容之外，或任意臆杂进去的，而是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主要人物形象及其环境

之关系的描写，紧密联系着的。对每篇作品的所谓“油滑”之处作出细致的考察，乃是正确分析和评价人物形象的重要一环；对八篇作品所有的“油滑”之处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更是理解通过人物形象所展示的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重要关节。分析每篇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不可能回避对“油滑”之处的考察和研究，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准确地认识这些人物形象的实质和社会意义。当我们毫不犹豫地从事物形象的分析出发，对八篇作品中一系列重要人物形象作出细致的分析之后，整个《故事新编》的所谓“油滑”问题的真相和实质，就会豁然明了；作品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应该是研究“油滑”这个老大难问题的必由途径，也是正确分析和评价整个作品的可靠的方法。

再谈从社会历史背景的现实生活实际出发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因此，如列宁所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①</sup>，以赖以发生的历史条件来说明历史事实。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探讨对《故事新编》的理解和评价问题，归根结底，就必须考察和研究作品产生的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对于理解和评价《故事新编》带有关键性的所谓“油滑”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也只有把它提到近百年旧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范围内，

---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才有可能找到对这种现象的实质进行解释和评断的客观依据。《故事新编》这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作品，它的内容和形式，正是近代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旧中国特定的客观社会历史存在反映在文学创作上的产物。

读过《故事新编》，人们在其历史小说的形式下，都分明地感到：作品中的人物更象现实中的“今人”；其中的环境描写，更象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的某些情景。任何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历史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毫不困难地看到，《故事新编》决不是一部简单再现古代历史的创作。在鲁迅的其它作品和有关的回忆资料中，有许多根据也都说明，作家主观上的用心确实也不在这里。他并没有准备严格地按照历史记载，来描写真正符合古代的历史真实的人物和环境，而根本上是从创作当时的现实生活出发，着意在反映并服务于创作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和斗争。对于这一点，很多读者和研究者，其实是早已体会到了的。但人们感到困难的，是苦于对这个问题不能透过现象，看清其社会历史的实质，从而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评价。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就在于人们往往忽略了详细考察和研究这部独特的作品及其上述独特的状况所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根据，没有注意从这种考察和研究中，去探寻对作品及其上述特点的社会历史实质的理解和说明。这里所说的对特定社会历史根据的考察和研究，指的是综合性的考察和研究，而不是指就事论事地对某些支离破碎的历史事实的叙述。过去的评论，对某篇作品具体写作背景或某个人物和情节的现实依据的现象罗列，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却都没有把这些东鳞西爪的现象综合起



来，透过现象来考察和说明其共同的社会历史本质，因此也就不能达到从根本上、从总体上揭示《故事新编》独特内容和形式的实质，解开研究和评述《故事新编》的根本性难题——所谓融古铸今的“油滑”问题。

经验告诉我们，要对社会科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尤其是争论不清、一时不易解决的困难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说明，首先必须对该一问题所研究的对象——即社会的现实生活内容，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寻找解答问题的实际依据。据说，毛泽东同志在与人谈话时，也曾肯定过“先对科学对象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再回答科学理论的问题”的科研方法。<sup>①</sup>我认为，这正是前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要求，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正确运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也就是说，文学是以它特有的方式（即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对社会现实生活进行分析研究并通过艺术形象做出反映和评价的学问。因此，对一种文学现象，归根结底，必须到它所由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去探求其根源和实质；即首先对它所研究和反映的社会现实生活，进行调查研究，从而最后求得对它的理论上的说明。

《故事新编》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国。无疑，要说明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特点和实质，首先应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作一些调查研究。多年以

---

① 参见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载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